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项目批准号: 13YJAZH059)



网络空间利益 博弈与治理

鲁佑文 著

WANG LUO KONGJIAN LIYI
BOYI YUZHIL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网络空间利益
博弈与治理

鲁佑文 著

WANG LUO KONGJIAN LIYI
BOYI YUZHIL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与治理 / 鲁佑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 - 7 - 5203 - 4213 - 1

I. ①网… II. ①鲁… III. ①互联网络—社会问题—研究
IV. ①C913.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341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11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鲁佑文教授的《网络空间利益博弈与治理》一书即将付梓，希望我写几句评述以代序，我一向没有这个习惯，只因本题也是我关心的议题，于是勉力写几句感言。

网络空间里的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大题目，其内容涉及到：公民话语的表达与影响，自然，这话语包括各种个人理性与情绪化的意见；网络舆论与各种社会思潮以及背后的政治角力；突发性公共事件引发的政府应急，包括公共政策与措施的出台；基于网络治理，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等等。这么多的议题相互参杂，原本，是不适合做单一学科来研究的。作者意识到这一点，有意将“网络空间利益博弈与治理”议题的探讨，置于世纪之交和新世纪初十余年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一宏大背景之下，揭示网络空间利益博弈的内涵、主体、对象与内外条件，着重分析网民与政府话语权的博弈、境外势力与国内政治力量的较量、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竞争与融合发展、政府及主流媒体对网络空间的治理，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策略，经由传播学的视角，也约略可以在纷繁复杂、矛盾交织的话题中有所聚焦。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借助互联网和移动媒体，人类不断生产、传播并消费信息，并依托信息发展起日益庞大的信息产业。人类社会因互联网而创造了新的生活空间，而那里也是各种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博弈之地，各政府、国际组织，

各企业、技术社群，各群体、公民个人之间展开各种对话与较量。相应地，这必然也带来新的问题：如何和平、开放、安全地共享网络空间？

为寻找共同治理网络空间的良策，作者主要分析了如下几对利益主体的博弈：

1. 网民利益的网络表达与政府回应及公共政策的形成；
2. 各类自媒体、社交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统媒体的融汇；
3. 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络博弈；
4. 以技术为主导的 IT 企业与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
5. 网民个体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利益之争。

对于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作者有一些基本结论颇值赞许，例如：政府作为网络空间最有影响的利益主体，应快速适应网络时代特征与要求，找到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之间的最大交集；应致力于化解矛盾，满足网络社会合理诉求；对涉及社会公共领域的主要问题，应尽可能上升到政府管理层面，形成公共政策；主流媒体应转变话语方式，真正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找到真正的社会“问题单”，专业化地报道和置评，并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和路径。尽管未及深读全部的论证，但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实践价值的合理建言。的确，网络空间利益表达主体复杂多元，它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公共平台，也是政府进行有效治理的新空间；它是社会矛盾冲突的解压阀，也是政府危机公关的新契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空间利益博弈与治理》一书即使没有提出全部的治理共识，它也至少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里颇具启迪的政策话题。

谨此，聊作荐语。

杜骏飞

2019年4月于南京花神湖

目 录

第一章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及其出现	(1)
第一节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研究缘起	(2)
一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亟待转型阶段	(2)
二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	(4)
三 网络空间各利益主体的意见表达异常活跃	(7)
四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的内部基础与条件	(8)
五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的外部因素	(9)
第二节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界定	(10)
一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内涵	(11)
二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的网络环境	(11)
三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主体	(12)
四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的对象与内容	(13)
五 网络空间博弈的法律法规与政策	(13)
第三节 网络新媒体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14)
一 中国从互联网大国到移动互联网大国、强国	(15)
二 微传播已然成为社会的主流传播	(15)
三 网络空间监管与治理变得越来越紧迫与重要	(16)
第四节 网络空间政治活动的开展	(17)
一 网络民间舆论场的勃兴	(17)

二	微信、客户端、各种论坛和网站中的民间意见表达	(20)
三	传统媒体开办“两微一端”，与新媒体融合发展	(20)
四	各类政务新媒体兴办与发声	(23)
第二章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的类型	(25)
第一节	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博弈	(25)
一	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博弈首先体现在对受众注意力的争夺中	(27)
二	传统媒体奋起直追与网络新媒体争夺媒介影响力	(29)
第二节	网民与政府话语权的博弈	(32)
一	网络媒体借助网络科技实现对公民的网络赋权	(32)
二	在网络空间中大有新媒体引发、主导舆论之势	(34)
第三节	境外势力与国内政治力量的博弈	(36)
一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	(37)
二	美国利用互联网企图主宰世界	(39)
三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寻求合作并建立网络空间新的秩序和规则	(42)
第三章	网络及其文化与主流媒体及其文化的博弈	(46)
第一节	网络发展与网络文化传播对传统社会影响	(47)
一	网络及网络文化特征与功能	(47)
二	网络发展与网络文化传播五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56)
三	网络文化传播现状分析	(70)
四	网络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与挑战	(81)
五	网络文化传播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93)
第二节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103)

一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背景	(103)
二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现状	(110)
三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18)
四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对策	(122)
第四章	网络舆情与政府回应	(130)
第一节	网络舆情的基本特征	(131)
一	真实性与虚拟性统一	(131)
二	稳定性与易变性同在	(132)
三	建设性与破坏性并存	(132)
四	干扰性与可导性互通	(133)
第二节	网络舆情与政府管理的关系	(134)
一	民情喷涌与民怨消解的共同场所	(134)
二	传递政策与吸纳民智的有效路径	(135)
三	政治社会化与民主训练的重要形式	(136)
第三节	政府回应网络舆情的基本认知	(137)
一	网络舆情宜疏不宜堵	(138)
二	技术控制基于法治精神	(139)
三	严守底线逐步敞开言路	(140)
第四节	两个舆论场互动下的社会企稳	(141)
一	两个舆论场及其互动背景与现状	(141)
二	网络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互动对策	(145)
第五章	境外势力的渗透和国内政治力量的较量	(152)
第一节	境外势力网络空间的渗透	(152)
一	网络空间成为博弈主战场	(153)
二	意识形态——网络空间核心利益	(154)
三	技术与文化的双重赋权——渗透的温床	(156)

四	意识形态渗透无孔不入	(157)
第二节	国内政治力量对网络安全的维护	(162)
一	网络安全技术突破	(162)
二	增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	(163)
三	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动性	(164)
四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65)
第六章	政府及主流媒体对网络空间的政治治理与引导	(167)
第一节	加强网络舆情的监测	(167)
一	网络舆情监测的内涵及意义	(167)
二	网络舆情监测的流程及体系	(168)
三	网络舆情监测平台及服务机构	(171)
四	当前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72)
第二节	政府加强对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	(177)
一	政府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必要性	(177)
二	我国政府引导网络舆论的困境所在	(179)
三	政府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途径	(181)
四	加强对重点网站的管理	(183)
第三节	主流媒体对网络舆论的积极引导	(184)
一	传统主流媒体引导网络舆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85)
二	传统主流媒体引导网络舆论的具体举措	(187)
第七章	网民提升媒介素养水平	(192)
第一节	意见领袖发挥正能量	(192)
一	网络时代的意见领袖	(193)
二	网络时代意见领袖对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194)
三	意见领袖发挥正能量的具体途径	(197)
第二节	普通网民加强媒介素养	(200)

一	媒介素养的定义	(200)
二	当下中国网民媒介素质状况及问题表现	(200)
三	如何提高网民媒介素养	(203)
第八章	法律法规对网络空间的规范治理	(208)
第一节	建立健全网络法律法规，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	(208)
一	建立健全网络空间法律法规的意义	(208)
二	我国制定网络空间法律法规的历程	(209)
三	我国网络空间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213)
四	治理网络空间的违法犯罪行为，首先要建立健全 网络法律法规	(215)
第二节	惩戒网络空间违法犯罪行为	(219)
一	既运用法律治理网络空间，又发挥宣传及道德 教育功能	(224)
二	加强顶层设计与技术研发并重	(227)
三	发动社会力量，鼓励全民参与打击网络空间违法 犯罪	(229)
四	加强国际间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合作	(231)
参考文献	(236)

第一章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及其出现

21 世纪，是信息化时代，是数字化时代，是智能化时代，是网络化时代。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不开信息。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智能手机等媒介工具，人类不断生产、传播并消费信息，并依托信息发展起日益庞大的信息产业。网络科技带来人类经济社会新变革，人类社会因互联网而创造了新的生活空间，使网络与现实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国网民人数已达 7.72 亿人，占世界网民人数的 1/5。^① 这一数字已超过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5.8%。中国互联网行业整体向规范化、价值化发展，同时，移动互联网推动消费模式共享化、设备智能化和场景多元化。^② 互联网络空间各种权利主体、利益主体相互依存又相互博弈，包括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科研院校和公民个人之间展开各种竞争与较量。相应地，这必然给人类共享互联网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和平、开放、合作并安全地共享人类发展的新成果，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与共识。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7 年 12 月。

^② 同上。

第一节 网络空间利益博弈研究缘起

一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亟待转型阶段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双重转型期。中国历经近 40 年改革发展，一方面经济社会全面深入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从 2010 年开始跃居世界第二位，并保持继续发展，2015 年人均 GDP 突破 8000 美元，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① 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当前同样有可能遭遇发展中国家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瓶颈。这归因于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刚进入工业社会的初期，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价格偏低，形成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快速实现工业化。但当人均 GDP 达到或超过 4000 美元特别是达到 8000 美元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成本迅速提高，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复存在，于是经济增长的幅度大幅下降，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图发展。二是社会管理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往往注重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忽视经济发展成果的再分配、再调节，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拉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加剧，可能造成社会动荡与不安并最终影响经济的发展。三是政治体制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关心的是如何发展经济、赚钱养家糊口、解决温饱问题，而在政治方面的诉求相对较少。但当人均收入达到 4000 美元后，人们对政治参与、政治表达的意愿普遍增强，不同利益主体呈现多元政治表达与诉求。尤其是当人均收入达到 10000 美元左右，物质生活较大改善、整体向着小康迈进，加上人们文化水平整体提升，此时人们对自身各种权力、权利的诉求大大增强。这必然反映至政治和对现实政治治理结构层面。在网络与新媒体日益社会化的今天，人们对这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6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

些领域的诉求也许表现得更加广泛和强烈。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经济从增长方式来看，过去近40年近两位数的快速发展和跃居世界第二位并直逼美国经济总量，主要靠巨大的人口红利、廉价的劳动力、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生态人居环境较大牺牲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粗放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长久、持续性地发展，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较大风险。中国本是人均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靠拼资源换取经济的发展，已经给环境造成较大压力与破坏。比如对水资源的污染破坏，中国许多大江大河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个别地方的水体甚至受到根本性的破坏。又比如化工企业、重金属企业排放的废弃物和有害气体对土壤和植被的污染，以及对大气环境的改变，其损害程度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从社会管理层面来看，当前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矛盾。这些问题与矛盾，既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也有改革开放近40年因过多强调经济发展的效率、忽视社会劳动成果分配的公平性带来的诸多问题。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下，中国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的速度上去了，但社会贫富悬殊问题产生，贫富差别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仇官、仇富现象日益突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不满情绪不断堆积。这显然不利于化解日益累积的社会管理风险，甚至不断加大社会维稳的成本——网络新媒体言论环境一度非常紧张。

从政治体制层面来看，随着4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推进，人们经济条件的巨大改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自1994年至今的网络文化传播24年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思想与观念日趋多元，其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愿望极大提高，对既有政治体制造成巨大压力。

因此，转变过去40年推行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走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利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势在必行。合理、科学、高效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关停、并、转那些高能耗、低产出、产品质量低劣又高污染的企业实体，不断加大科技、科研在企业实体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力度与比重，走内涵式、集约式经济发展的模式成为必需。从社会管理层面观察，要保持经济社会长期稳定与发展，必须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的处理。经济快速发展，必然带来国家和社会财富的激增，能够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能够解决社会业已存在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系列问题。但必须引起社会高度重视的是，应协调并处理好社会分配特别是再分配的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协调经济发展效率与社会分配公平关系。从政治体制改革角度，为促进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快速发展，必须协调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改革进程相配套的关系，改革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生产关系。

二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与问题的最新表述，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论断。中国历经 40 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已经积累起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GDP 经济总量自 2010 年开始已稳居世界第 2 位，人民生活已经越过了温饱阶段，人均 GDP 在 10000 美元左右，迈入小康社会并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往前发展，中国人民需要的是“美好生活”，需要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何谓“美好生活需要”？就是环境美好，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协调；人民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共享天下太平，互助友爱，扶危济困，仁爱精诚，诚实守信。

一是社会信用问题。中国社会信用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信用问题、文化信用问题、法制信用问题。人无信不立，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遭受较大损害。在经济领域，涉嫌欺诈、逃税漏

税、不讲信用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教育领域，比如学生平常不认真向学，临近考试不讲诚信，利用各种电子通信工具传播参考答案，利用各种手段传递参考答案，而且屡禁不止。2015年6月7日，《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替考组织在南昌参加高考。其后《南方都市报》配合警方，彻底端掉这个由42人组成的替考团伙^①。教师为名利，在科研论文撰写、评奖等活动中剽窃、造假也时有见诸媒体。在司法领域，这个本该由全社会筑牢的社会良知与正义的最后一道底线，也时有被践踏。

二是贪腐问题。过去十年，中国查处大量贪腐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国每年查处的贪官约4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2000多人，司局级干部200多人，省部级以上高官33人，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② 腐败已经触及社会的诸多角落，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影响社会信心的重要因素，腐败也是导致社会不公、引起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官员腐败，致司法不公，致一些冤假错案产生。因此必须用“猛药”阻止腐败问题长期存在与蔓延，有效地遏制并最终从制度层面根本性地阻遏其发展。

三是道德滑坡。近些年发生在食品、药品领域的危及人们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地沟油”事件、医用针头重复使用事件、药品售假事件，已经让国人震惊。部分国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的降低，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去40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弱化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领域改革。经济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如果缺少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和舆论监督，民众赋予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就会因缺少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而恶性膨胀。

① 中国教育在线 (<http://gaokao.eol>)。

② 何家弘：《中国腐败犯罪的原因分析》，《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

四是社会贫富悬殊问题。4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以来，中国国民整体收入和财富快速增长。但因为分配政策、发展机会、个人能力、发展起点、地区发展水准等差异和不同，个人收入、财富积累近些年有进一步拉大的风险。国际上比较通行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为“1”时，表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基尼系数为“0”时，表明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为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基尼系数为0.3左右；21世纪初，基尼系数逐渐增大。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虽然有小幅回落，但仍居高位，2014年的基尼系数为0.469。而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维持在0.24—0.36。比如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部分在0.3—0.4，日本、韩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26，美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0.45^①。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同时，还带来居民财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有数据表明，中国居民财富差距远远大于其收入差距。那么，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差距悬殊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呢？首先这会直接带来社会成员特别是社会富裕阶层与社会低收入阶层之间的不信任，仇富、仇官现象严重；其次是降低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带来社会内需不足，从而迟滞经济增长，不利于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最后是带来低收入人群社会人力资本供需不足，影响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是社会群体事件、舆情事件频发。现阶段，我国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而且有上涨之虞，这背后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广泛发生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资纠纷、环境污染、事故维权、房产纠纷、医患冲突、警民对立、城管与商贩争斗、民间金融、劳资纠纷和互联网专车改革等多个领域。1993年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为0.87万起，而到2005年，猛增至8.7万起！

^① 冯华：《聚焦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第17版。

2006年超过9万起。^①新闻媒体将2008年称为“群体性事件爆发年”，并对2009年作出了易发群体性事件的高危警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均呈现出人为策动、组织严密、准备充分的特点，有为首者或骨干从中进行串联、指挥和操纵。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酝酿之初就成立了自发的组织。在移动互联网高速成长、社交媒体广泛便捷使用的信息网络环境下，人员的线上与线下互动性、迅速聚集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通过线上组织形成了策划、招募、安排、总结甚至发放报酬的一整套流程，线上安排与线下实施的同步推进，重大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已经呈现出典型的互联网+特点。总之，互联网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结构影响日益深入，部分组织机构对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为群体性事件的滋生提供了便利条件，部分参与者利用互联网上的各类新媒体提升了社会动员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进而加大了群体性事件的负面影响。

三 网络空间各利益主体的意见表达异常活跃

信息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编辑，彻底撕破了非信息网络时代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写作生产、表达与传播不再是传统媒体与政权阶层的特权，成为一种普遍的人权。网民可以利用各种自媒体、社交媒体、商业媒介进行信息、资讯和意见的生产、储存、传播和进行媒体运营。2018年8月20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道，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8.02亿，网络普及率为57.7%。其中，手机网民规模已达7.88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3%。中国言论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中国网民，中国网民在网络空间的各种信息与意见的生产、传播、参与和互动，显得特别活跃，时而兴奋、激动、张扬甚至谩骂，时而沉郁、寡言、悲观甚至无望，时而热闹、围观、讨论，时而理性、创造、创

^① 王文华：《群体性暴力事件与仇恨犯罪：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回应》，《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